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六五期 ——
(二〇〇一年七月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0 7 b)

【研究动态】	透视“文革”	童志刚·胡发云等
	文革成“天方夜谭”并非空谈	司传人
【往事追忆】	那几年的经历——我看到的“文革”后半截	韦君宜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季羨林
	“啊！延安……”——忆程贤策	乐黛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研究动态】

透视“文革”

• 童志刚·胡发云等 •

《今日名流》编辑部邀请部份在武汉学者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议题是“透视‘文革’”。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有该刊主编童志刚，专业作家胡发云，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齐勇博士、邓晓芒博士，华中师大中文系教授王又平，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毅、李工真和湖北省审计学校教务处主任刘晓航。

◇ 童志刚：透视“文革”：有谁不是罪人？

人们把“文革”称为一场“浩劫”，这已经是定论。我觉得，这场浩劫的最大特点，是事实上几乎所有有“参与能力”的人都参与其中，并热情高涨地、义无反顾地为它添砖加瓦、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在绝对一致的表相下面，每个人的参与理由和现实心态又是那么的复杂和不同，以致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各种“文革史”或回忆录总显得那么遮遮掩掩、语焉不详。一方面它印证了“当事者迷”这句老话，同时它也使另外一种民间说法——“在文革中没有谁是‘乾净’的”——成为坐实之论。据了解，就连最近获得普遍好评的《牛棚杂忆》（季羨林）、《思痛录》（韦君宜）等，也被一些知情者认为是存在相当保留的，就是说，在一些问题上，

叙述者由于各种原因而做了有意的回避和省略。

◇ 胡发云：“文革”的结果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隐匿者”

我们在1978年匆匆忙忙把“文革”打了个包，束之高阁，包里面是什么东西，谁都不要看了，也不要清点，反正我们已经作了结论了。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学者或是其他参与者、关心者，对“文革”研究的自由度还是非常小的，这有种种原因，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文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并没有结束，它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识形态上，及其他种种依赖关系，依然制约着我们对“文革”的正常表述或思考。第一，至今为止，我们对“文革”的研究依然是在一种强势语言的解释下进行，有很多规定好了的解释你不可能突破。第二，首先有必要对“文革”的过程和事件进行一种清理。“文革”像一头极其巨大的象，我们每个人都只摸到它的某个局部。要把事件本身弄清楚，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需要全国各地、各种派别、各种观点、各种阶级地位、各种不同结局的人都能够参与。重要的一点，“文革”是亿万人投入的政治事件，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它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如果我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又不利用这种资源，那就比付出代价本身还要可悲了。现有的反映“文革”的文学作品、纪实作品或理论研究著作，都时时可感觉到一种隐匿现象。季羨林先生的《牛棚杂忆》涉及他参加“新北大公社”的一段，就写得极其含糊不清。实际上，当时一些教授、作家、右派及“胡风分子”等，在文革的某一阶段，都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参与者，是一种蠢蠢欲动的、使出浑身解数的姿态。而刚刚粉碎“四人帮”，将“文革”作一种脸谱化的定位时，他们非常快地抓住“文革”初期受迫害的形像，以致固定下来，一直演绎到“文革”结束。而把曾经积极参与的另一段经历非常深地隐匿下来了。还有一批隐匿者，就是今天依然在台上的一部份官员，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依然是不可言说的。所以，“文革”最终的结果，是一大批的隐匿者不知躲到哪里去了。重新寻找这些“文革”的隐匿者，让他们重新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一些部份责任，让他们发出自己对历史该发出的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已有一些官方性质的“文革”史，如果没有新的材料去补充，它们以后就会成为正史。在当事人还活着的时候，不进行甄别的话，这些人死后，这些“文革”史更是白纸黑字，不可改变了。第三，说“文革”的发动、推进是权力之争，我以为不准确。它应是意识形态之争。当时中央权力结构基本上是稳定的。而老百姓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政治地位出发，他们参加“文革”的动机极其复杂。右派、胡风分子、大学教授等一些知识分子，这样一些不在体制中心的人，他们参加“文革”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与1957年相近，有疏离体制和反体制的情绪在里面；社会底层也是这样。这些组织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各阶层自己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群在新体制下的心态和利益及其在“文革”中的要求和反映，都很有研究价值。

◇ 刘晓航：应该抢救历史资料

我很赞同这一点，作为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文革”已经过去了，但作为文化和精神层面的“文革”，依旧顽强地在中国活着。一，对“文革”研究的定位，一是要注重对“文革”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的研究，关键是要恢复它的历史真面貌；二是要注重对民众“文革”的研究，研究民众利用高层权力斗争这个机遇反抗官僚体制的现象。二，“文革”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不能忽视。从一定意义上说，“文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催产婆”，如果不搞“文革”，中国的旧体制就不会解体，“文革”的悲剧证明旧体制走进了死胡同。另一个是“文革”造就培养了一批人，成为后来推动新时期转换的重要力量。“文革”中人们为什么那么狂热，十七年的教育制度是一个很大的缘故，胡发云讲过这样的观点。（胡发云插话：我是作过这样的表述，如果“文革”前受教育的一批人，没有“文革”的运动冲击来让他们改变人生道路，而在旧体制下培养成非常团结、非常精密的这样的队伍，那么今天的中国还会在“老路”上走下去。）（李工真插话：这一代人可能把持续

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中的坚定信念积蓄在10年当中或者说3年当中一次性释放了，这就为新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契机）。三，再介绍一些目前“文革”研究的状况。国外研究的有两批人，一批是外国人，他们的研究是一种远距离的、宏观的研究，研究“文革”是为了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体制下人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一批出国人员，他们对“文革”的研究已在国际上引起了重视，1996年，海外研究“文革”形成高潮，出版著作数百种。国内的研究也有两批人，一是中央党校党史研究所的金春明他们作的课题研究，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简史》；还有一批人是学者的零散的研究，像季羨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思痛录》，还有李锐等人的《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徐友渔主编的《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等。

◇ 邓晓芒：要打开人们心中的那个“黑箱”

一，我觉得对“文革”的反思，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打开人们心中那个“黑箱”；“文革”以后，中国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黑箱，里面装着什么，别人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种观点来照亮你对自己的本心、对他人的思考的话，你要比较客观地、原原本本地把当时的时间描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描述，并不是你只要不带任何私心杂念地把它写下来就客观了，那不一定，像韦君宜的《思痛录》，她是非常客观的，凭回忆写，记忆力也非常好。但你还是觉得有些东西没有说出来，因为她看不到，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一种观点，一种思想来引领。二，“文革”还没有结束。“文革”不是历史上的偶尔发生的一个事件，而是中国人内心深处一直在笼罩着的那样一种情绪，在“文革”中爆发出来，变成现实。现实虽然过去了，那种情绪却还在，到下个世纪恐怕也不会完全消失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说，“文革”是一次小小的农民起义，它跟历代农民起义是有关联的，对这些东西的检讨，“文革”以后基本上没有展开，总是追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或某某人起了坏作用。三，对人性的发现和认识，“文革”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我把“文革”看作是宋江让李逵“排头砍去”最后被收拾的过程，在底层民众那里，当时基本上就是一种李逵精神。一批像李逵这种貌似民魂实为官魂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拿着斧子排头砍去。这种李逵精神是我们民族传统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并不是从苏联社会主义运动中学来的。四，关于知青与“文革”的关系，反思自己，我觉得当年上山下乡和后来参与“文革”是一种情绪，是同样一种观念在起作用。一种理想一直在支撑着我们。这种理想的核心，就是民众崇拜，自觉地把自己降到农民的水平，不要任何超出他们的地方。支撑“文革”的精神，正是农民的“痞子精神”，平均主义，以及原始的天人合一、上下合一、一切都打成一片这样一种文化心理在起作用，“文革”跟知青下放是同一个原理。追溯“文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项羽烧掉阿房宫。

◇ 李工真：“文革”这种运动，恰恰要等到传统道德完全死光的时候才能发生

一，当时都渴望革命。十七年教育很有技巧，一方面保持了人伦道德的教化，好像一切都很平静，人们不会去偷盗、强奸，可都置身于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之下，可以说是在政治恶棍的控制之下。二，当时都崇拜领袖。当时在权力圈子里，有人有意要把毛泽东造成一个神，老百姓也非常希望有一个崇拜的对象，他们没有崇拜对象，就好像慌了神。结果大家为人处世的落脚点和最终的追求目标，就是忠于毛主席。三，“文革”是“一代新人”干出来的。我父亲（著名数学家李国平——编者注）对我讲，他教了那么多学生，凡是解放前教出来的，没有一个敢走到台子上公开讲李国平你如何如何的，一个都不敢。解放以后毕业的学生，哪怕是1952年1953年毕业的学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愈演愈烈，1965年收进来的学生，那就不是文斗了，一个个都用拳头对付他了。四，“文革”与纳粹运动有共同点。“文革”与纳粹运动可以理解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极左、极右两种极权形式。（胡发云插话：我一直说“文革”不能与纳粹运动作简单类比，它们有很大区别，文革的内质比纳粹运动要复杂的多。“文革”中有形形色色的人，各阶层的人都在

顽强的表现自己的诉求——阶级诉求或者个人诉求。我记得“文革”时成立过一个“1957年右派甄别委员会”。是纯民间性的，他们自己为自己平反，这显然是对1957年的一种反叛，这绝对和上层发动“文革”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对领袖的崇拜也是各取所需，为各自利益用最高指示打语录仗。）

◇ 王又平：要警惕，“文革”思维已成为我们集体无意识的一部份

可以肯定，“文革”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影响范围所及，是世界性的。由于文化语境和当下语境的不同，中国人和外国人对“文革”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西方人提出“多数人专政”现象，即少数人的话语被淹没在多数人话语当中去了，少数人话语成了边缘话语。他们还以为“文革”是抗拒工业化体制和抗拒资本主义精神的一种解毒剂。“文革”的话语方式就很值得研究。“文革”盛行一种权力话语。开口闭口就是“我们无产阶级认为”、“我们马克思认为”，如何如何的，到今天学校一广播“否则后果自负”这样的词句，我们就毛骨悚然，“文革”时代这样的词句用的很多，也很吓人。回头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基本上就是“文革”话语方式的范本。“文革”的政治运作方式，基本上是民本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封建时代，民本主义是一个很高的理想。可它一直不是作为社会理念存在，而是充当了政治工具。到后来就转化成了一种政治权术，像“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类东西，实际上就是怎么利用老百姓的政治权术。“文革”运用的正是民本主义的政治操作方式。通过政治操纵，调动底层民众的潜力，并导向破坏性发展。运动的目的是摧毁既有的一切，而建立什么东西却不明确，社会理想是一种乌托邦。“文革”又是多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积累的思维方式的一次总演练，60年代初到“文革”，有两个基本口号，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向雷锋同志学习”。一个是政治性的，一个是伦理性的。正是权力意志和道德意志的驱动和支撑着“文革”，而“文革”缺乏的恰恰是现代意识中的法律意识和理性意识。如果我们要研究“文革”，最重要的首先就是要把“文革”种种的内在价值，思维方式，行为操作模式等都消解掉。我们自己也非常习惯这种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除非我们自己非常警醒。“文革”思维已成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的一部份，这是关键的一点。

◇ 薛毅：“文革”研究中待解决的问题很多

一，关于“文革”研究的意义。在“文革”中，中国有上亿人受害，国民经济损失5000亿元，文化上影响了几代人。它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但它又以其独特的方式动摇了它赖以发动的基础。它使各种“左”的错误、过时的观念以最完备、最极端、最集中以致最荒诞的形式呈现于人们面前，从而使我们有可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认识其本质和根源；它以传统文化的畸形发展和封建主义残余的猛烈膨胀，引起人们对封建残余的高度警惕和对传统文化的深沉反思；它以长期的动乱和空前严重的损失，在实践的法庭上剥夺了“左”的错误为自己作合理性辩护的理由。二，关于“文革”研究的状况。“文革”一结束，对“文革”的研究就已开始。90年代以来，由于全国范围的编史修志及共和国史研究的深入，“文革”研究又出现高潮。80年代以来，研究“文革”成为国外学术界的一个热点。1996年，西方出现了“文革”热，其讨论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是“两个‘文革’说”，即“领袖‘文革’”（上层权力斗争）和“群众‘文革’”（下层群众斗争）。三，“文革”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重视领导而忽略群众。“文革”中群众为什么会达到那种程度的狂热？毛泽东为什么会得到那种程度的支持？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毛泽东一系列关于社会平等的主张无疑点燃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希望之火，因而得到了广大工农兵和青年学生的认同，尽管这些在实际上不过是虚幻和苦涩。（二）重视决策而忽略实践。中央发布“文革”的决策要研究，中国10年历史实践的方方面面，也要研究。（三）就基础工作而言，全国至今没有一个研究“文革”的机构，甚至连民间社会团体也没有，没有学术团体就无法开展学术交流

，此外“文革”的档案资料尚未有组织、有步骤地公布，还有大批“文革”文物史料散落民间，无人征集。

◇ 郭齐勇：社会乌托邦理论，是“文革”暴力合法性的根据

“文革”不仅仅是权力斗争，“文革”涉及到诸阶层，诸利益集团的调整，是它们的合力的结果。“文革”爆发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矛盾问题比上层政治人物的权力之争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人认为，“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是“特权阶级与非特权阶级对立”的产物，也有人认为是“受惠阶层与受损阶层”之间的矛盾。后一主张是王绍光博士的观点。他认为，在“文革”前的中国，精英分子与广大群众的矛盾并不十分突出。同为精英，政治精英是受惠阶层，职能精英是受损阶层；同为群众，积极分子是受惠阶层，落后分子是受损阶层。拿定息的前资本家享有一定的特权，但他们是受损的。生活水平底下的工人当然不能称为特权阶级，但他们是受益的。用“特权阶级与非特权阶级对立”的分析框架解释不了为什么“文革”中精英和群众都从内分裂了。“文革”中毛用权力的分散达到权力的进一步垄断。权力的垄断，在昨天是“文革”的暴力，在今天又成为腐败的根源。人权主要是公民权。“文革”所以发生，是因为人民的公民权、财产权是毫无保障的。崇拜暴力，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暴力万能，使得公民权财产权成为空言。着使我想起今天先富起来的农民很可能遭到乡亲的公开抢劫。从湖南农运到红卫兵运动到今天还可见到的某些现象，使我们必须正视暴力崇拜的负面。公民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是必须有輿情环境等约束加以保证的。为了某种乌托邦可以任意剥夺别人的自由，可以行暴力，就是“文革”的暴力合法性的根据。

∞ ∞ ∞ ∞ ∞ ∞ ∞ ∞ ∞ ∞ ∞

文革成“天方夜谭”并非空谈

• 司传人 •

季羡林先生在为马识途“文革”回忆录《沧桑十年》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充满忧虑地说：“我现在痛苦地发现，浩劫结束才不过二十来年，今天再同年青人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以为我们是谈‘天方夜谭’……照这样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的人越来越多，消逝的记忆也越来越多，再过上十年八年，这一场空前的悲剧真会变成了‘天方夜谭’。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丧失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近来在阅读中，竟意外发现，不仅是青年，甚至在老一辈的“文革”过来人中，也对“文革”历史产生了不应有的遗忘。

这样的例子，先是在《随笔》1998年第6期上李国文先生的《小人礼赞》一文中发现的。李国文这篇文章说，中国作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小人”们不间断的作践，心理与生理都得到了充份锻炼，因而增强了对苦难的承受力，并总结说：“当代小人的贡献，就在于对中国作家的磨练，使他们具有了好好赖赖能熬过来的坚强，实在是功不可没的。”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李先生却举了一个十分不恰当的例子，说：“这个结论是根据外国作家自杀率较高，而中国作家相对要低的比较中得出的。”李先生还举出了茨威格、海明威、杰克·伦敦、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三岛由纪夫等一批自杀的外国作家为例，说中国作家在“文革”期间，“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受不了凌辱而跳湖、而开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外，没有人写绝命书，没有人尝试过自杀，甚至连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

这样说，就未免太离谱，太有悖史实了。

中国作家在“文革”十年中的自杀者，果真是只有“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

吗？当然不是。笔者从极为孤陋的见闻中，即查到这样一些作家在“文革”中含恨自杀的资料：

邓拓（《燕山夜话》作者，诗人、杂文家、新闻工作者），1966年5月18日服药自杀。

叶以群（文艺理论家），1966年8月2日跳楼自杀。

老舍（小说家、剧作家），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杀。

陈笑雨（文艺理论家），与老舍同日，投河自杀。

傅雷（作家、文学翻译家），1966年9月3日与夫人一起上吊自杀。

陈梦家（早年著名“新月派”诗人，后为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家），与傅雷同日自杀。

白辛（作家，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编剧），1966年9月服毒自杀。

杨朔（散文家），1968年8月3日自杀。

周瘦鹃（著名“鸳鸯蝴蝶派”作家，散文家），1968年8月12日投井自杀。

李广田（散文家），1968年11月2日投池自杀

闻捷（诗人），1971年1月13日开煤气自杀。

.....

仅从这个极不完备的名单即可看出，中国作家在“文革”十年中远非只有“一两位老先生”自杀。假如再加上那些死因尚存某些疑点但通常被认为是自杀的作家，如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1967年2月10日“跳楼自杀”）、小说《敌后武工队》作者冯志（1967年“上吊自杀”）等，人数就更多了（今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上赵淮青《文化界逝者的风骨》一文，就是针对李国文此文而作的，详述了许多文化界名人自杀的情况，但赵文“为尊者讳”，未提李国文先生的大名）。对照这些血淋淋的历史篇章，再来看看李国文先生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没有人写绝命书，没有人尝试过自杀，甚至连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不能不令人困惑。难道李先生在“文革”中和“文革”后都是“桃花源中人”，对中国作家曾经有过的遭遇竟会如此陌生？李先生为了证明外国作家自杀的比中国作家多，一口气举了十来个自杀的外国作家为例，似乎确实比他所说的中国作家中自杀的那“一两位老先生”要多得多。其实，仔细一想，这种比较法又是一个明显的错误。让我们看一看李先生所举的那些外国作家自杀的时间吧：

杰克·伦敦，1916年（服麻醉药过量而死，通常被认为是自杀）。

有岛武郎，1923年。

叶赛宁，1925年。

芥川龙之介，1927年。

马雅可夫斯基，1930年。

茨威格，1942年。

法捷耶夫，1956年。

海明威，1961年。

三岛由纪夫，1970年。

川端康成，1972年。

可以看出，李先生所举的这些外国作家，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的不同年代自杀的，而且他们分别属于美国、日本、奥地利、苏联等不同国家，分别自杀于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其中，在与中国“文革”十年相同的时间段里自杀的，只有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两位。如果要作比较，应该是一国与一国，同一时间段与同一时间段相比才合适，才有“可比性”。否则，我们不是还可以把从屈原到王国维、朱湘的自杀者都扯上来凑数吗？

李国文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竟还写了更加令人惊诧的一段话：“邓拓先生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多么慷慨大义！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坛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邓拓“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吗？不知李先生的这一印象是怎么得来的。众所周知，邓拓是“文革”中自杀的第一人，他并非“低头接受批斗”，而确是“杀身成仁”——以死抗争了。而且他在自杀前留下了遗书（并不是像李国文先生所说的“没有人写绝命书”）。这是稍微了解一点“文革”史实的人都会知道的。怎么可以将这“文革”自杀第一例也遗忘了呢？

另一则同样令人大为惊诧的“文革”遗忘症的例子，是在一本好书中看到的：《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冰口述回忆录》，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口述传记丛书”中的一种。这套丛书是很不错的。然而，如白璧之瑕，在侯波、徐肖冰这本书中，出现了一个实在令人想不到的错误。

在回忆到杨尚昆那一段（《无微不至杨主任》）中，竟把杨尚昆的被打倒说成是因为他给毛泽东录音而“被江青、‘四人帮’紧紧抓住不放，而且添油加醋”地说成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所致，甚至还冒出来这样一句话：“杨尚昆被‘四人帮’揪出来以后……”（见该书246页）这才真是“天方夜谭”了。杨尚昆是被谁打成搞“窃听”，被谁“揪出来”的？众所周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文革”第一大冤案。这一冤案，是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按照毛泽东的授意定下来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76人（“四人帮”当时还无人有资格与会），主持这次会议的，自然更不是“四人帮”，而是后来被“文革”打倒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杨尚昆被“揪出来”时，根本就还没有“四人帮”（江青等四人尚未进入中央领导层并结成帮派），“四人帮”中的王洪文那时还只是上海一家工厂保卫科的普通基层干部，连听这个中央高层会议精神传达的资格都没有。

这一例比李国文说邓拓“做不到杀身成仁”那一例更为令人不解。因为作为作家的李国文，有可能完全不知道邓拓自杀的事（尽管另一作家袁鹰写邓拓自杀前后情况的散文《玉碎》曾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选入多种书中，但李先生完全有可能没有读到过）。而侯波是在中南海里担任摄影科科长，是杨尚昆的直接部下，应该知道当时是谁把杨尚昆“揪出来”的。怎么会有这样的误记？

我很难相信这是出于遗忘。会不会是整理者太年轻，不了解当时情况而在整理时写错了？但是，据说一本书的出版，还要经过编辑以至总编的“三审”。难道审读这本书稿的人都弄不清楚当时情况？遗忘，不仅会使一些历史事实不能得到正确的陈述，而且会影响到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吸取。李国文《小人礼赞》一文中将许多中国作家没有在“文革”中自杀的原因归之于经受了“小人”磨练而增强了承受力。“小人”只是传统文化中与“君子”相对立的一个不甚明确的概念，一般泛指品质恶劣见利忘义之徒。用来指代在新中国的“革命”政治运动中充当“革命动力”的某些人物，未免有些欠妥。这个概念不能说明为什么在50年代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会有那么多的人“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说他们是“见利忘义”吗？他们许多人确是为了“利”，但这是为了“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个“利”与“义”（革命大义）已合二为一。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久经考验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反脸无情相互揭发批判，才会有至亲骨肉划清界限“大义灭亲”……须知，那些运动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那些充当“革命动力”的人物，自然有的是属于个人品质不好（但从“革命利益”的需要来看却是很好、很可贵、很值得提倡的），但这类人只能说是少数甚至“极个别”，相当多的“革命动力”们（甚至包括许多被当作“革命对象”受到批判折磨的人在内），却是在“革命”的召唤下错用了自己的热情，其中有的也只是

像某些大人物一样不得已“说了违心的话”。

今天人们都已了解很多了，有些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反右”时就曾无情地批判过别人；有的在“反右”时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反胡风”时也曾无情地批判过别人；还有在解放初期即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延安时期也曾无情地向被诬为“托派汉奸”的王实味打过棍子……能说他们都是“小人”吗？何况，这一次次越来越“革命”的政治运动，都是并非由“小人”，而是由属于“伟大”一级的大人物发动起来，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等堂而皇之的口号下开展起来的，仅仅归罪于“小人作祟”，“浮云蔽日”，显然是不恰当的。

巴金在《十年一梦》一文中如实写下了他在“文革”初期诚恳接受批判时的心态：“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巴金还总结说，他当时甘心承认自己是一个“精神贵族”，实际上已成了一个“精神奴隶”。这对于许多中国作家在“文革”中没有自杀的原因，恐怕比“小人”磨练说更有代表性也更深刻吧？

现在看来，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年轻人对“文革”的无知了，还得加上过来人的遗忘。这更说明，许多有识之士一再呼吁的加强“文革”研究，建立“文革博物馆”，确是十分必要的啊！

~~~~~

## 【往事追忆】

### 那几年的经历 ——我看到的“文革”后半截 • 韦君宜 •

1973年春天，我被调回北京。临走之前，那些还走不了的“学员”送我，自然有的跟我叹叹苦经，希望我不要忘记一同在这里“流放”了几年的干校“同学”。我们在这里平时也看看报纸，也知道文艺界已经全归湮灭，再无文艺可谈，只希望回去看看家人孩子，度过余生而已。至于人和人的关系，在干校这最后两年，倒还有所缓和。

我可没看想到，刚回机关报到，就又看到了几年前的那种“战斗气氛”。回去以后第一次党委会，我蒙恩准出席。抬眼一看，只有（严）文井、李季和我算是原文艺界的，有一个水暖工人和一个大学新出来的工农兵学员，算是群众代表，此外满堂都是身穿军服的军代表，完全是我们刚到干校时迎接我们这些“走资派”的那副阵势。

第二天，一位现任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的军代表就来访问我，问我的历史，是不是军人出身。我实在不是军人，但在我初到晋西北那时候，也实在没有把老百姓、干部（群众运动工作者）和军人区分的那么清楚。我是晋西北青联的干部，又穿军服，也背过枪，跟三五八旅民运部行军，也算民运部的人，所以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只好“唔，有的”含糊答应。对方一听，立即发表高论，说：“还是要军人出身，这才能路子正啊！”一面说，一面立即把我杯里的开水倒在地板上，又不停地添水，弄得我满屋水，想是在表示敬意。可是我心里立刻明白了，他很快就会知道我并非真正的军人出身，而在他眼里，仍一如过去林彪所说：“人分三等，军、干、群。”有如印度的婆罗门、首陀罗阶级，其等级差别与生俱来一样。——其实，他在参军前是一个县里供销社的售货员。



很快，我就知道了，从干校调回的老编辑，没有一个当上组长，没有一个恢复原职。担任组长以上职务的，不是军代表，就是由军代表从外单位干校调来的人。这些军代表，为首的是一位师政委，当兵出身；两位担任部室主任的，是连长或连指导员；其他是排长。其文化水平，有一个是高中，其他都是初中。至于到外单位调人，主要看一项：出身是否工农；再有，在干校是否是左派。从外单位调来的人也曾告诉我们，刚进文学出版社，就由军代表告知，这里是黑窝，要小心、小心。我们的兄弟出版社还有好几个，也都有穿军服的政治领导人，但是业务主任由军代表担任，而且如此济济一堂，那是只有我们出版社才有的。至于放在党委会里这两个“旧文艺界”的人哩，后来才明白，原来是弄回来专供做靶子用的，后文再表。

我碰上的头一件事，是党委会讨论从干校往回调人的事。各位军代表和外来“左派”，根本不认识我们的干校老编辑，都像“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似的：“要这个吧。”“那个历史还简单，要那个吧。”我坐在那里，心想提两个从政策上来说最有理由的，也许能通过。两个都是老编辑，非党员，历史都清白，从来没有划过任何分子，政治上一个是民盟北京市的宣传委员，一个是从抗战开始便归国参加抗战的老华侨。现在“中央文革”虽然批资反修，摆的样子却很讲统战，有好些外籍华人回国，就很受欢迎，我想，难道现在还不该放他们俩早点从“早稻田大学”里回来？就是作为政策上照顾照顾，也是应当的吧。于是我这样说了。

但是我的提议却受到在座军代表和“左派”的一致反对。他们说：“凭什么照顾？要照顾，得按中央的杠杠，中央一级的。他们是民主党派和华侨组织的中央委员吗？”“政治上靠不靠得住，没有保证。”于是我碰了一鼻子灰，这才知道我在这里无权提任何意见，也知道了自己还不懂这里的“杠杠”是只指“中央一级”的。但是，我还没懂得在这里发言就有危险。

开始工作了，送来许多根本不能看的稿子，词句都不通。我说了一句：“这没法出书。”那位在我屋里拨过水的军代表便大发议论，教训我：“出书有什么要紧？我们的目的，是育人！把这些学习写作的工农培养成人，不能只看出书这样小的目标！”我想，出版社的目的，不是出书，而是花钱费力来“培养”思想文辞都无可取的投稿人，我们是跟那个人有什么特别关系吗？他不再讲下去，我也不能再问了。

紧接着，又叫人出去“取经”，我到大寨、小靳庄都去取过经。第一批被派到上海，取回来的经是“不要提篮买菜，而要自己种菜”。即不要经常出去组作家的稿件，也不要外边的投稿，更不要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冲动，只要编辑拿着“上级”发下的“菜籽”来捏咕成菜就行。那时上海有一本《虹南作战史》，是一本小说体的报告文学，据说就是这样“种”出来的，称为“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也便照方抓药，派人出去，到各处指定“坑”来栽萝卜。

说老实话，我们对于这些实在说不上是“文艺主张”的主张，当时确实未敢发表任何议论。如果真要议论，哪里是三天两天说得清的？我们只是低头照办，把自己关于文艺的一切基本知识一概扔进东洋大海而已。可谁也想不到，就在这种完全缄口不语的局面下，竟然还是闹出了一场“反黑线回潮”。

“反黑线回潮”，顾名思义，就是反对我们这些“文艺黑线”旧人的复辟行为。但当时，并没有任何人对于八个样板戏、“三突出”公然提过任何不满，更无处可发表，要“反黑线回潮”，从哪儿说起？

从与文艺“黑线”、“红线”都毫无关系的闲话说起。原来，有一批曲艺演员，应江青、于会泳之召，来北京会演。曲协老主席陶钝去看望他们。这些老演员不

忘旧谊，在宾馆房间里给陶钝唱了几段。这件小事被江青知道了，竟变成一场大风波，说陶钝在宾馆里听演出是抢在“中央领导”的前面审查节目，这就是篡夺领导权，就是“旧文艺黑线回潮”，得在整个文艺界全面开展“反黑线回潮”的运动！

于是到处反起来，我们这个出版社自不能幸免。我社有一个曲艺编辑贾德臣，因为曾送稿给陶钝看，这回人事处长秉承上意，把他打成了“篡夺领导权”的阴谋者，关在机关里不许回家。我们这几个文艺界的旧人，自然又成了靶子。李季和严文井的罪状，因为与文艺毫无关系，所以我实在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李季是为了他在下火车来社报到前，向外人说明身份时顺口说了一句：“我是个作家。”大概还说了那军代表并不懂文艺，于是这就成了他妄图压倒军代表的“重大罪行”。严文井是什么罪，似亦相似。至于我自己的罪行，倒记得清楚：

第一罪行是阴谋“挤沙子”，想把军代表挤出去，以便恢复“黑线”统治。事实是曾有一位姓何的军代表，就是那个高中程度的，对自己有一点自知之明，曾觉得在此工作不甚合适，而且家属也不能来京，他自己提出过回部队。当时小组开了欢送会。我在会上发言，表示走得很可惜，要走我们欢送。后来其他各位军代表提出不让他走，也就没有走。这时，前一阵这几句未成为事实的话，竟突然引起了各位军代表的群起而攻，开会批斗，他们说：韦君宜为什么不竭力挽留何某？这就是要挤走沙子，仇视沙子。上次为什么要调那两个非党干部（一个华侨，一个民盟）？就是因为他们俩才是她的心尖子。他们还大声责问：“你和他们两什么关系？”（其实我和他们二人连闲谈都很少，老编辑谁不知道？）

然后，我们的人事处长（新由外单位调来的转业军人）又揭发我的老底，说有一次我曾跑到人事处来要人事档案看，还说：“人事处的事，你有什么权力来管？这分明是阴谋，要在档案里找革命左派的茬子，好去挤沙子嘛！”——这话一说，在座的穿军装干部哄然响应，齐声说：“就是排挤我们！是典型的黑线回潮嘛！”这就又抓住了我一条“回潮”罪证。可怜我哪里晓得，我这个所谓“党委委员”，根本无权去了解自己所管部门的干部档案！（我在干校当指导员时，还把全连队学员的档案通读了一遍哩！）这与文艺一点关系没有的事，却也成了“文艺黑线回潮”，这是第二件罪行。

我的第三件“文艺黑线回潮”罪行，是那位泼我一屋水的军代表，在还未发现我不是军人以前，跟我说过一句客气话：“我在这里当领导，真是困难，不如在部队工作。”我把这话告诉过别人。这怎么又是“文艺黑线回潮”？更是莫名其妙。

后来，由为首的军代表做了决定，给所有军代表提到连级以上，据说这样即可把在农村的家属一律调来北京，想必这就是把“红线”请进来，就是“反黑线回潮”的行动了。我这才多少摸到了些何谓文艺“黑线”与“红线”。这类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记不胜记。记得军代表叫我们“出门去向工农兵学习”。于是有的去部队，有的去农村，有的去工厂。都说是“由工农兵当家做主人”，要由工农兵为主写稿子，我们便跟着帮忙。实际上是工农兵写了头一遍，一般由编辑重写二遍，能剩下三五句就算好的了。我跟工厂那一组下去，写鲁迅研究。最妙是工厂党委书记，非常郑重地出来介绍他们厂的人员情况，他首先就说：“为了重视这件工作，我们决定我们厂的党委委员亲自参加写作工作，由她负责领导。”接着，门一开，党委委员和别的成员庄严地进来了。万万想不到，打头进来的，竟是我们的“小琴”——我们干校一位老“学员”的女儿，跟爸爸下来干活的干校子弟（很多家的孩子都是被军宣队赶到干校去的）。去年她17岁，回城找活干来了，如今成了工厂党委委员，我们（包括她自己的爸爸）得向她学习。只见她有点扭怩，几乎要开口称阿姨叔叔了，可又不敢叫，也不好意思摆出作为“工农兵”以供学习的谱儿，一句话没说。还是文井机灵，忙打招呼说：“我们是干校的同学呀。”我坐在那里，既觉得在此“受教育”的自己十分可怜可笑，又觉得在那里被迫“教育”人的小琴也够苦

的，这实在是一场由别人导演，我们老少一起出场的滑稽戏。

滑稽戏一多，人们就无法不笑，无法再郑重地对待它了。后几年，这些琐碎故事，实在连缀起来不成章句，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在“文革”初期，像我这样的“走资派”，固有自觉冤枉之感，一些小流氓、调皮鬼是想趁此捞便宜，而一般老实群众还是相信伟大领袖的号召，以为这次革命将扫荡污浊，使中国变成一个新天地的。然而一年一年，结果却是如此，以前那些真心革命的造反派，最后就把现在“造反”得势的造反派编成笑话来说了。例如，那一阵上海干部最时兴，大家就在办公室里开玩笑，比如推选哪个上海女同志，说她有希望当部长，或者背地给军代表起外号，叫“少爷兵”、“白脸兵”、“张沙子”、“李沙子”。特别我们单位有那么多沙子，比其他各出版社都多。我虽非扛枪打仗的真正军人，但毕竟也是戴过胸章臂章的八路军。我们社还有近十位真正的转业军人，本来，谁会不怀念自己曾在过的军队呢？可是，我们一下子都成了垫茅坑的泥土。这使我们和他们的感情被拉远了，怪不了我们。

我们社有一位全社数一数二的老实编辑，老王。“文革”开始，他一言不发，却全力拥护，以为一切最初做得幼稚的都出于革命动机，可以理解，中国从此要翻身了。到“文革”中期，我已好久没有跟他谈过话了，这时得到解放，趁探亲假去他家中拜访了一趟。他跟我谈了几句之后，忽然小心谨慎地对我说：“我想，这次‘文化大革命’恐怕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嘴里没回答，心里却忍不住哈哈大笑——“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了普通老百姓都已看穿的闹剧，书呆子，你还在等它解决什么问题！我不想跟他说什么了。以后到周总理逝世，天安门“四五运动”轰动了全国，天安门的诗到处抄，抄诗成了罪，最后忽然有本铅印的《天安门诗抄》秘密流传起来。当时，冒着被逮捕、枪毙的危险，秘密编印这本书的文艺界朋友是谁？我可真没想到，就是这位最初热烈信仰“文革”一切最高指示的老实人老王！

还有另一个老实人，向来领导说什么就信什么，人家说谁是坏人，她就认为谁是坏人，领导都愿意使用她。在干校，我被“解放”当了指导员之后，也就把她调来当了文书，交了一堆“专案”材料叫她整理。所谓“专案”，基本上都是胡言乱语、捏造诬陷之类的。我们查清楚了，要重新整理档案。她接受了任务，每日埋头伏案，什么话也没说。几天后，我下班时，她突然严肃地对我说了一句：“从今开始，我才知道人并不都说真话。人有真话，也有假话。”

人们对“文革”的态度，早期和晚期不一样，这一点现在大家都承认了。早期跟着斗的人多，晚期跟着斗的人少。而这些晚期继续跟着斗的人，其目的究竟在哪里？是仍然真心实意地想打倒“走资派”吗？尤其我们文艺界！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文化人、演员，罪状是主张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被赶走的医生，罪状是主张给城市老爷治病；挨打的校长、教师，罪状是主张以学生为敌来进行考试……这些人主张“走资”，所以非打倒不可。这都是当时起来“造反”的群众所真心相信的真理。而我们——这些文化人、医生、校长、教师，则的确就是多年来各司其职，不知自己有何错误，并未对自己所作所为有过怀疑。现在上级“中央文革”和群众忽然都说我们多年以来全错了，全是“走资派”，一律撤职、赶走，那就不能按原来那种走法走下去了。我们听上级的，听“中央文革”的，按着“中央文革”的指示，叫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自己的主张都取消吧！承认错误吧！所以，到了“文革”后期，实在已经并没有什么公开的两派主张之争了，但是却仍然不断地打“黑线回潮”，说：“走资派还在走”。打的是些什么主张呢？如上所述，我看是什么也没有。如果说有，那第一大概是看出我们内心的不满，必欲尽数消灭之而后快；第二没有别的，就是自己要当权，而实无主张。如是而已。

所以对后期这些“造反派”的真实动机，我是不能不怀疑的。

但是，说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主张，也不完全正确。在“四人帮”被抓起来之前不久，我偶然碰到了一本稿子，仿佛是为了一句不妥的句子，编辑拿来问我。而稿子已由组长（军代表）和主任（有终审决定权的那个军代表）都看过了，已经排成铅字，只等着出书了。我把这部稿子的清样放在桌子上，偶然翻阅了几页，发现内容太不像话，说的是一个小学放了暑假，孩子们如何坚决抵制老师，如何去搞阶级斗争，抓了一个搞破坏的地主。那些孩子完全不像孩子，满嘴阶级斗争，开口就训人，实在叫人讨厌。我就说：“我不大赞成出这本书。”

一会儿，那位军代表组长进来了，他解释道：“我要出这本书，因为它可以教育儿童，在假期里也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看着他，暂时隐忍，没有反驳，因为这种人的脑子不是几句话讲得通的。

又过一会儿，军代表主任（就是那位正路子出身的）进来了，瞪着眼睛对我说：“我是有终审权的，你不能推翻我终审过的稿子！”我也没说什么，只觉得稀罕。我们过去终审稿件，怕有疏漏，总常常找人参谋，哪有这样开口闭口“终审权”的。

我用无言的抗议把他们打发走，然后我到校对科把该书原稿拿来细看，看看到底是什么奥妙。

一看之下，我简直跳起来。这本书里有很多“四人帮”时代最红最红的“革命语言”，已经在发排时被删掉了，原有这种话：“我们要一枪两眼，把邓小平打个透心凉。”这是什么话？如何能出书？于是我表示坚决反对，对方两位军代表却仍坚持要出。在争议中间，正是“四人帮”覆灭的时候，我的胆子也大起来了。我就出了一张大字报，把这样几段话抄出来以供众览，闹得全社轰动。但是对方并不让步。他们说：“大字报上抄的这些话，是发排以前已经删掉了的，所以发排的书稿并没有问题。”这时候“四五运动”早已经过去，邓小平同志的“三落三起”已经成了群众关心的大事，但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登在报上，所以这两位军代表就仍继续同我吵，不服输，一张一张别字连篇的大字报，贴在走廊上。我气极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你们都看不见，你们是什么人？代表什么“文艺思潮”？气得我说：“删掉了，也还是这个人写的，你们不是要‘育人’吗？育这种人，专门要替他出书，育的什么东西？”连邻舍的另一出版社的同志都被惊动了，登楼看大字报，到处传说我们这段文艺新闻。

两位军代表这才没的说了。当然，此案早已过去了。但我想，如果现在重提此事，他们可能会完全否认，说这件事从未存在过，凭那气势汹汹的派头又会宣布自己是左派。但是，这份白纸黑字的清样和原稿档案，至今还在！

到最后，费尽心机，总算把这一批“沙子”和“左派”陆续送了出去，欢送时还都给他们写了挺好的鉴定，以上事件都没有说，因为如果鉴定写差了，人家部队不会要他们。这是我在“文革”结束时做的最后一件自欺欺人的事。我在“文革”十年中扮演丑角，总算洗脸下台了。

这些军代表目前状况我都不知道，只知大概回到部队以后，没有担任文艺领导工作（如果担任了，我总会听得到的）。有一次，我对一个在部队做文艺工作的朋友讲起这些苦恼，发旧牢骚：“如果你们〈解放军文艺〉要这样的人当编辑部主任，那就给我们也行。可为什么你们没要？”他笑着安慰道：“我们的命运未见得比你们强多少。至于这些人，不就是些初中学生吗？只是不懂什么，与文艺路线无关，你别生他们气。”

但是，这批“不懂什么的初中学生”，的确颐指气使地决定了文艺界好几年的

命运。说这算文艺史料，未免荒唐；可若说它不是文艺史料，又掩盖了历史。后世青年只知那十年的文艺仅似一片白纸，没有文艺，好像是跳过去的。这并不是事实。为了还其真面目，所以我把它写下来。

□ 摘自《思痛录》第十三章

∞ ∞ ∞ ∞ ∞ ∞ ∞ ∞ ∞ ∞ ∞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 季羨林 •

现在我真正紧张了。我原以为自己既无辫子也无尾巴，可人家“革命家”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且看上去都是十分可怕的，有的简直是鲜血淋淋的“铁证”。尽管我对自己没有失去信心，但是对这些“革命家”我却是完全没有办法了。在派性加形而上学的控制之下，我能有什么办法说服他们呢？

这是决不可能的。

我于是连夜失眠。白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恭候提审，晚上躺在枕头上，辗转反侧，睁大眼睛，等候天明。我茶不思，饭不想，眼前一片漆黑，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黑暗才会过去。能不能过去？我也完全失掉了信心。我白天好像都在做梦。夜里，在乱梦迷离中，我一会儿看到那一把菜刀，觉得有什么人正用那一把刀砍我，而不是我砍别人。我不禁出一身冷汗，蓦然醒来。我一会儿又看到那一只装满了烧掉一半的信件篮子。那篮子忽然着起火来，火光熊熊，正在燃向我的身边。我又出了一身冷汗，蓦地醒来。我一会儿又看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蒋介石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了满嘴的朱齿獠牙，正想咬我。宋美龄则变成了一条美女蛇。我又出了一身更大的冷汗，霍地从梦中跳了出来。

这难道是一个人过的日子吗？

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一些东西。

最可怕的是环顾眼前，瞻望未来。

环顾眼前，我已经坠入陷阱，地上布满了蒺藜和铁刺，让我寸步难挪。我反对那一位“老佛爷”（指聂元梓——编注），这一下子可真捅了马蜂窝。站在我对立面的不都是坏人，我相信绝大部份是好人。可是一旦中了派毒，则不可以理喻。他们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自思二十多年以来，担任东语系的系主任，所有的教员，不管老中青，都是直接或间接由我聘请的。我虽有不少缺点，但从不敢作威作福，总以诚待人。如今一旦分派，就视若仇人，怒目相向，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原来我认为是一派，态度与敌对的一派毫无二致。我被公社“打倒”了，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自己的红卫兵到我家来，押解我到属于井冈山的什么地方去审讯。他们是一丘之貉，难兄难弟。到了此时，我恍如大梦初觉，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最让我难以理解也难以忍受的是我的两个“及门弟子”。其中之一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烈属”的人，简直红得不能再红了，学习得并不怎样。我为了贯彻所谓“阶级路线”，硬是把留下当了我的助教。还有一个同他像是“枣木球一对”，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我在课堂上给他吃偏饭，多向他提问。“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我成了“阶级报复”者。就是这两个在山（井冈山）上的人，把我揪去审讯，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我的耳朵。我真是哭笑不得，自

己酿的苦酒只能自己喝，奈之何哉！这一位姓马的“烈属”屡次扬言：“不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金童玉女！”然而狐狸尾巴是不能够永远掩盖的。到了今天，这一位最理想的革命接班人，已经背叛了祖国，跑到欧洲的一个小国，当“白华”去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吐出的吐沫最后还是落在自己脸上！我脑袋里还有不少封建思想，虽然我不相信“一日师徒，终身父子”这样的说法。但是对自己有恩无怨的老师，至少还应该有那么一点敬意吧！

总之，我在思想感情中，也在实际上，完全陷入一条深沟之内，左右无路，后退不能，向前进又是刀山火海。我何去何从呢？

一年多以来，我看够了斗争走资派的场面：语录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脚踢，耳光相间；漫骂凌辱，背曲腰弯；批斗完了，一声“滚蛋！”踢下斗台，汗流满面。到了此时，被批斗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来。我作为旁观者，胆战心颤。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岂但辱而已哉！早已超过了这个界限。我们中华古国，礼义之邦，竟有一些人沦落到这种程度，岂不大可哀哉！原来我还可以逍遥旁观，而今自己已成瓮中之鳖，阱中之兽，任人宰割，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何况还有别人都没有的装满半焚信件的篮子。一把菜刀和蒋介石的照片。我就是长出一万张嘴，也是说不清了，我已是“罪大恶极，罪在不赦”。但是要我承认“天王圣明，臣罪当诛”，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我知道，我的前途要比我看到的被批斗的走资派更无希望。血淋淋的斗争场面，摆在我眼前。我眼前一片漆黑……

我何去何从呢？

我必须做出抉择。

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个世界，第一条我是绝对办不到的；看来只有走第二条道路一途了。

这是一个万分难做的决定。人们常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倘有万分之一的生机，一个人是决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况且还有一个紧箍咒：谁要走这一条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自绝于人民”。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手中还剩下唯一的一点权力，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如果这是“自绝于人民”的话，我就自绝于人民一下吧。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还怕什么呢？“身后是非谁管得？”我眼睛一闭，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

决定一旦做出，我的心情倒平静下来了，而且异常地平静，异常地清醒。

我平静地、清醒地、科学地考虑实现这个决定的手段和步骤。我想了很多，我想得很细致，很具体，很周到，很全面。

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历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几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门去，问了他若干问题，不知道是否动手动脚了。我猜想，这还不大可能。因为“造反”经验是逐步总结、完善起来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来的。我总的印象是，开始时“革命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一般是比较温和的。然而我们这一位汪教授脸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连温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药，离开人间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引起了极大震惊和震动。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地下党，为人治学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

第二个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某某（指程贤策，见下文——编者）。对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年纪虽不大，也真是一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他的罪名按逻辑推断应该是“走资派”，他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杠杠。他挨过批斗，六·一八斗“鬼”时当过“鬼”，在校园里颈悬木牌劳动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这些“待遇”他实在无法忍受，一时想不开，听说是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后再把敌敌畏灌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一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内像火烧一般，一定是满地乱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

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路上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这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每个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是血淋淋思想斗争，我无法想下去了。

我的思绪在时间上又转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当时有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我的思绪时间上更向后回转，一转转到了古代，我想到了屈原，他是投水死的。比屈原稍晚一点的是项羽，他是在四面楚歌声中自刎死的。对自刎这玩意儿我实在非常担心。一个人能有多大劲能把自己的首级砍下来呢？这比用手枪自杀原始得多了，我想，如果当年项羽有一把手枪的话，他决不会选择刀剑。

我的思绪不但上下数千年，而且纵横几万里，我想到了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法西斯头子们。据说，他们自知罪恶多端，每个人都准备了一点氰化钾，必要时只要用牙齿一咬，便可以上天堂或入地狱了。德国化学工业名震寰宇，他们便把化学技术应用到自杀上，非其他国家所能望其项背。日本人则以剖腹自杀闻名于世，这是日本人的专利，没听说其他国家向日本学习的。不过这种方式一个人还实行不了，因为剖了腹一个人也是不会立即死去的，必须有一个助手在旁，自杀者一经剖腹，助手立刻砍下他的脑袋，日文叫做“介错”。我还听说，日本青年男女在热恋最高潮时往往双双跳入火山口中。这也不能普遍实行，没有火山的地方，就绝对行不通的。

就这样，我浮想联翩，想入非非。有时候，我想得非常具体，非常生动，我把死人想像得就像在自己眼前一样，我仿佛看到了鲜红的血流满尸体，可怕而又具有吸引力。我知道，这决不会给我带来愉快，然而却是欲罢不能，难道上苍就真不给我一条活路了吗？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自杀学，可现在非考虑不行了。我原以为离开自己很远很远、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了。我决无意于创建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杀学或比较自杀学。现在是箭在弦上，非创建不行了。凡是一门新兴学科，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我在别的方面理论水平也很低，对于这一门新兴的比较自杀学，我更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想法当然是有一点的。我不敝帚自珍，现在就公开出来。

我用不着把历史上和当前的自杀案例一一部搜集齐全，然后再从中抽绎出理论来，仅就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抽绎出不少的理论来了。使用历史唯物主义

阶级分析的方法，我能够把历史上出现的自杀方式按社会发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类型。悬梁、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强的方式，从原始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能使用。今天也还没有绝迹。可谓数千年一贯制了。氰化钾是科学发达国家法西斯头子的专用品。剖腹和跳入火山口恐怕只限于日本，别国人是学不来的。这方式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可以使用。至于切开动脉仅限于懂点生理学的知识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服安眠药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方式，是世界上颇为流行的方式，无论姓“资”还是姓“社”，都能懂得的。不过，我想，这也恐怕仅限于由于脑力劳动过度而患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终日锄地的农民是不懂得服安眠药的。我为什么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呢？中药有镇静剂，但药力微弱，催眠则可，自杀不行。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安眠药半出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服安眠药自杀最保险，最无痛苦。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优越性表现之一吧。

我的理论基础大抵如此。

在自杀行动中，决心下定以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决定用什么方式。我想到了服安眠药自杀。方式既已选定，大功告成就在眼前。我可以考虑行动的时间和地点了。时间问题很容易解决：立即实行，越快越好。至于地点问题则颇费周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恕我借用一个当时极为流行的词儿——要考虑大方向。大方向无非是有两个：一近一远。近是就在家，远则要走出家门。最方便当然是在家。但我顾虑重重。我们家里只有一大间一小间房子。如果在家实施我的计划，夜里服下安眠药，早晨一起床，两个老太太看到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她们即使不被吓死，也必然被吓昏。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呀！我一生为别人考虑过多，此时更是不得不尔。总之，在家不行。

那就到外面吧。在外面也有一个方向问题，而且方向的头绪更多。我想来想去，想到了后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圆明园。这里有极大的苇坑。时值初冬，芦花正茂。我倘能走到芦苇深处，只须往地上一躺，把安眠药一服，自己的目的立即达到。何等乾净，又何等利索！想到这里，我对自己非常满意，我高兴得简直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认为，这简直是我的天才的火花的最后又最光辉的一次闪烁。过此则广陵散矣。决心一下，决不回头。我心情平静，我考虑我这五十多年的一生最后几个钟头必须做的事情。我有点对不起陪我担惊受怕的我那年迈的婶母，对不起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伴我度过了四十年的老伴，对不起我那些儿女孙辈，对不起那恐怕数目不多的对我仍怀有深情厚谊的亲戚和朋友。我对不起的人恐怕还有很多很多，我只能说一句：“到那边再会了。”我把仅有的几张存款单，平平淡淡地递给婶母和老伴，强抑制住自己，没有让眼泪滴在存款单上。我无言地说：“可怜的老人！今后你们就靠这一点钱生活下去吧！不是我狠心，也不是我自私，茫茫宇宙，就只给我留下这样一条独木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她们一定明白我的意思的，她们的感情也没有激动，眼泪也没有流下。我没有考虑立什么遗嘱，那毫无用处。伴我一生的那些珍贵的书籍，我现在管不了啦，这就是我生离死别的一幕。一切都平静得平淡得令我害怕。

我半生患神经衰弱失眠症。中西安眠药服用的成箩成筐，我找了一个布袋子，把安眠药统统装在里面，准备走出门去，在楼后爬过墙头，再过一条小河和一条马路，前面就圆明园。

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我迈步出门——

然而门上响起了十分激烈的敲门声。我知道，红卫兵又光临了。果然，一开门便闯进来了三个学生，雄赳赳，气昂昂，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他们是来押解我到什么地方去进行批斗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深知自己毫无发言的权力。我只是一头被赶赴屠宰场的牲畜，任人宰割，任人驱使。我立即偷偷地放下那只装着安眠药的袋子，俯首帖耳，跟着出去。家里的两位老太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押走。她们也同我一样一言不发。当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生杀大权操在别人手中的时刻。走在路上，我被夹在中间，一边一个红卫兵，后面还有一个，像是后卫。他们边走边大声训斥，说我的态度恶劣至极，竟敢反唇相讥。今天要给我一点颜色看，煞煞我的威风。我只有洗耳恭听，一声不吭。我意识到，一场特大的风暴正在我头上盘旋。我以前看过的那些残酷斗争的场面，不意今天竟临到自己头上了。原来只是一个旁观者，今天成了主角了。说心里不害怕，那不是真话。但是害怕又有什么用处呢？我脑袋里懵懵懂懂，又似清楚，又似糊涂，乱成一团。

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就被押解到一个地方。我低头看到地面，我知道这是大饭厅，这是全校最大的室内聚会场所。我从后门走进去，走到一间小屋子里，那里已经有几个“囚犯”，都成了达摩老祖，面壁而立。我不敢看任何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也被命令面壁而立。我的耳朵还没有堵上，我还能听到说话的声音，有的声音我是熟悉的。我只觉得人影纷乱，我只听得人声嘈杂。我屏心静气地站在那里。蓦地听到一声清脆的耳光声，而自己脸上并没有什么感觉，知道是响在别的“囚犯”的脸上的。我心里得到了一点安慰。但是立刻又听到了一声更为清脆的耳光声，声音近在眼前，我脸上有点火辣辣的。我意识到，这一声是发生在自己脸上了。我心里有点紧张了。可是我的背上又是重重的一拳，腿上重重的一脚。我吃了老虎胆、豹子心，胆敢起来反对他们那一位女主人，他们把仇恨集中到我身上，这是很自然的。我自作自受，又何怪哉？除此以外，我想还有别的根由：有的人确实是从折磨别人中得到快感享受的。

大轴戏终于来了。我蓦地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羨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了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我的右臂，拧在我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来一只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脖颈上，不让我抬头。我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好，我就弯腰。“低头！”好，我就低头。但是脊梁上又重重挨了拳：“往下弯！”好，我就往下弯。可腿上又凶猛地被踢了一脚：“再往下弯！”好，我就再往下弯。我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双手悬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承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情况，要我变成那个样子。他们工作作风谨严至极。光是调整我的姿势，就用去了几分钟，可我的双腿已经又酸又痛。我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我知道那样一定会招来一阵拳打脚踢。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了。

忽然听到身后主席台上有人讲话了。台上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我更不清楚。至于台下的情况，我当然不敢睁眼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口号之声震天动地。那个讲话的人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听。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的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他是站着？是坐着？是跪着？还是坐喷气式？我都不清楚。我只听得清脆的耳光声，剧烈的脚踢声，沉重的拳头声，声声不绝。我知道他正在受难。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可我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况且我的双腿已经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了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

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此时闹哄哄的大饭厅里好像突然静了下来，好像整个大饭厅，整个北大，整个北京，整个中国，整个宇宙，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突然间，大饭厅里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伏彼起，如大海波涛：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棚车。我意识到我的戏还没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膊。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吐沫。我招架不住，也不能招架。汽车只是向前开动。开到什么地方去？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十年，每一寸土地我都是稔熟的。可我现在完全糊涂了。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住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路旁的喊叫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我脑袋里糊里糊涂，昏昏沉沉。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了一条心，听天由命吧。

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车开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了。一个人——不是学生，就是工人——一脚把我踹下了汽车。我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拚命爬了起来。一个老工人走上前来，对着我的脸，猛击一掌，我的鼻子和嘴里立即流出鲜血。这个老工人，我是认识的。后来，当8341部队进校时，他居然代表北大的工人阶级举着牌子欢迎解放军。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够得上当一个工人吗？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我当时嘴里和鼻子里鲜血都往下滴，我仓皇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头顶上工人阶级一声断喝：“滚蛋！”我知道是放我回家了。我真好像是旧小说中在“刀下留人！”的高呼声中被释放了的死囚。此时我的灵魂仿佛才回到了自己身上。我发现，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我就这样一瘸一拐，走回家来。我的狼狈情况让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然而立即转惊为喜：我总算是活着回来了。

这是我活了五十多年第一次受到的批斗。

□ 摘自季羨林《牛棚杂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 ∞ ∞ ∞ ∞ ∞ ∞ ∞ ∞ ∞ ∞

“啊！延安……”——忆程贤策

• 乐黛云 •

1948年，我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后来迁往台湾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还有提供膳宿的北京师范大学。我选择了北大，只身从偏僻遥远的山城来到烽烟滚滚的北方。其实，也不全是“只身”，一到武汉，我就找到了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新生接待站。接待站负责人程贤策是武汉大学物理系的高才生，却在这一年转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相熟后他告诉我，他所以转系就是因为他认为当时不是科学救国的时机，他研究历史，希望能从祖国的过去看到祖国的未来。他体格高大，满脸笑容，有条不紊地组织我们这帮二十几个人的“乌合之众”，沿长江顺流而下，到上海转乘海船，经黑水洋直达塘沽，再转北京。他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与我过去的山村伙伴全然不同的新人。他对未来充满自信，活泼开朗，出口就是笑话，以至后来得了“牛皮”的美称。记得那天黄昏时分过黑水洋，好些人开始晕船。我和程贤策爬上甲板，靠着船舷，迎着猛烈的海风，足下是咆哮的海水，天上却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他用雄浑的男低音教我唱许多“违禁”的解放区歌曲，特别是他迎着波涛，低声为我演唱的一曲“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更是使我感到又神秘，又圣洁，真是无限向往，心醉神迷。他和我谈人

生，谈理想，谈为革命献身的崇高的梦。我当时17岁，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人格魅力的吸引。

北京不如我想象中的壮观、美丽，从山清水秀的故乡来到这里，只得到处是灰土。前门火车站一出来，迎面扑来的就是高耸尘封的箭楼，不免令人感到压抑。但是一进北大，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尽管特务横行，北京大学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们在校园里可以肆无忌惮地高歌：“你是灯塔”，“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甚至可以公开演唱“啊，延安……”，北大剧艺社、大地合唱团、民舞社、读书会全是革命者的摇篮。那时北大文学院各系科的新生都住在城墙脚下的国会街，就是当年曹锟贿选，召开伪国会的“圆楼”所在地，当时称为北大四院，今天是新华社的办公地点。程贤策一到校就担任了北大四院的学生自治会主席，我也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接着到来的是一连串紧张战斗的日子，我们都在工作中沉没，我和程贤策也就逐渐“相忘于江湖”。

直到三年后，我们又一起参加了农村的土地改革。那时，北大文、史、哲三系的绝大多数师生都去江西参加革命锻炼，他们和很少几个地方干部一起，组成了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一些著名学者如唐兰、废名、郑天挺等也都在这个团，参加了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行列，程贤策则是这个团的副团长，掌管着全体北大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们这些全然没有社会经验，也全然不懂得中国农村的分子和青年学生突然掌握了近十万农村人口的命运，甚至有了生死予夺的大权！我们当然只有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绝对按照《土改手册》的条条框框行事。我被派为一个拥有四千多人口的大村的土改工作组组长，我当时不过十九岁，经常为如此重大的任务，内心深处感到十分茫然，十分缺乏自信，有时甚至浑身发冷！当时正值大反“和平土改”上级指示：要把地主阶级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农民才能翻身。我们村已经按《手册》划出了八个“地主”，上级还是认为不够彻底；直接领导我们的、当地的一位副县长一再指出我们这个村是原“村公所”所在地，本来就是恶霸村长的“黑窝”，一定要狠批狠斗。他多次批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思想太“右”，手太软，特别我又是“女的”，更是不行。他多次指示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打倒地主威风，重新“发动群众”。由于总感到我这个“女组长”极不得力，后来终于亲自出马，突然带了几个民兵，来到我们村，宣布第二天开大会，八个地主统统就地枪决。我争辩说，《手册》规定只有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才判死刑，他说我们这里情况特殊，不这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又告诫我要站稳立场。我无话可说。第二天大会上，我亲眼看见好几个妇女在悄悄流泪，连“苦大仇深”的妇女主任也凑在我的耳边说：“那个人不该死！”她说的是在上海做了一辈子裁缝的一个老头，他孤寡一人，省吃俭用，攒一点钱就在家乡置地，攒到1949年这一生死界限（土改以这一年占有的土地为标准划阶级），刚好比“小土地出租者”所能拥有的土地多了十余亩！这个裁缝并无劣迹，还常为家乡做些善事，正派老百姓都为他说情，但我们只能“按照规章办事”！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见枪杀，看见“陈尸三日”。我不断用“阶级斗争是残酷的”这类教导来鼓舞自己，但总难抑制心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悲哀。好不容易支撑了一整天，晚上回到我所住的村公所，不禁瘫倒在楼梯脚大哭一场。那时村公所只住着我和废名教授两个人，他住楼下，我住楼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来到我身边，把手放在我头上，什么也没有说。我抬起头，发现他也是热泪盈眶！

不久，工作团开全团“庆功会”，总结工作。我怀着满腔痛苦和疑虑去找程贤策。他已完全不是黑水洋上低唱“啊！延安……”的程贤策了。他显得心情很沉重，眼睛也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他仍然满怀信心地开导我，他说我们不能凭道德标准，特别是旧道德标准来对人对事。“土改”的依据是“剥削量”，“剥削量”够数，我们就有义务为被剥削者讨还血债。至于“量”多一点或少一点，那只是偶

然，不可能改变事情的实质。恩格斯教导我们：“认识必然就是自由”，有剥削，就有惩罚，这是必然，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会有任何歉疚而得到心灵的自由。这番话对我影响至深，后来凡遇到什么难于承受的负面现象，我都努力将其解释为“偶然”，听毛主席的话则是顺从“必然”。程贤策又通过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他最近才认识到：由于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出身，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任何第一反应都经过严格的自省，因为那是受了多年封建家庭教育和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尤其是人道主义、人性论，这也许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动机之一，但现在已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对立面，这正是我们和党一条心的最大障碍，因此，摆在我们眼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彻底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他的一席话说得我心服口服，不知道是出于我对他从来就有的信任和崇拜，还上真的从理论上、感情上都“想通了”。总之，我觉得丢掉了多日压迫我的、沉重的精神包袱，于是，在庆功总结大会上，我还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思想转变作了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典型发言。

虽然同在一个学校，而且他后来还担任了我所在的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但我再单独面对他，已是十年之后的事了。这十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1958年，我已是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极右派，被分配到京西丛山中一个僻远的小村落去和地、富、反、坏一起接受“监督劳动”。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充当我们的监督者的“下放干部”。1961年，几乎全国都沉落在普遍的饥饿中，许多人都因饥饿而得了浮肿。程贤策代表党总支到我们的小村落慰问下放干部。那时，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已是“敌我界限”！白天，在工地，他连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夜晚，是一个月明之夜，我独自挑着水桶到井台打水。我当时一个人单独住在一个老贫农家。这是沾了“右派”的光。下放干部嫌我们是“臭右派”不愿和我们朝夕相处，让六七个男“右派”集中住到一间农民放农具的冷屋中，女“右派”只我一人，原和四位女下放干部挤在一个炕上，她们大概总觉不太方便。例如有一次，她们冒着严寒，夜半去附近村落收购了很多核桃，用大背篓背回，连夜在屋里砸成核桃仁，准备春节带回家过年。收买农产品是下放干部纪律绝对禁止的，她们见我这个“敌人”无意中窥见了她们的秘密，不免有几分狼狈，又有几分恼怒，没几天就把我赶出屋去和一对老贫农夫妇同住。我和老太爷、老太娘同住一个炕上，他们待我如亲生儿女，白天收工带一篮猪草，晚上回家挑满水缸，已成了我的生活习惯。我把很长很长的井绳钩上水桶放进很深很深的水井，突然看见程贤策向我走来。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讲，只有满脸的同情和忧郁。我沉默着打完两桶水，他看着前方，好像是对井绳说：“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这样深入长期地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过一会儿，他又说“党会理解一切”。迎着月光，我看见他湿润的眼睛。我挑起水桶扭头就走，惟恐他看见我夺眶而出的热泪！我真想冲他大声喊出我心中的疑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这饥饿，这不平，难道就是我们青春年少时所立志追求的结果吗？”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知道他回答不出，任何人也回答不出我心中的疑问。

时日飞逝，五年又成为过去。我万万没有料到我和程贤策的最后一次相见竟是这样一种场面！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几乎北大的所有党政领导人都被定名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上了“斗鬼台”。身为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程贤策当然也不能例外。记得那是六月中旬酷热的一天，全体中文系师生都被召集到办公楼大礼堂，这个大礼堂少说也能容纳八百人，那天却被挤得水泄不通，因为有许多外系的革命群众来“取经”。我们这些“监管对象”专门被强制来看“杀鸡”的“猴儿”有幸被“勒令”规规矩矩地坐在前三排。一声呼啸，程贤策被一群红卫兵拥上主席台。他身前身后都糊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上又画满红叉，泼上黑墨水，他被“勒令”站在一条很窄的高凳（就是用来支铺板铺床的那种）上，面对革命群众，接受批判。我坐在第二排，清楚地看到他苍白的脸，不知是泪珠还是汗水一滴一滴地流下来。批判很简短，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文艺黑线的急先锋、招降纳叛的黑手、结党营私的叛徒等罪名都在预料之中，但“深藏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却使我骤然一惊，接着又有批判说他是国民党青年军打入共产党的特务

我这才想起来，他曾和我说起过他十六、七岁时，为了抗日，曾去缅甸参加过抗日青年军。他曾不止一次地和许多人聊天，当众夸耀他游泳的技术多么棒，如何多次横渡缅甸的伊洛瓦底江。这能是“深藏”的“特务”吗？我正在百思不得其解，又一声呼啸，程贤策被簇拥下台，一顶和他的身高差不多的纸糊白帽子被扣在他的头上，顿时又被泼上红墨水、黑墨水，墨水掺和着汗水流了一脸！革命群众高喊革命口号，推推搡搡，押着程贤策游街，我目送他慢慢远去，根本挪不动自己的脚步！

这一天的革命行动终于告一段落，我们都被放回了家。我家里还有幼小的孩子，急急忙忙回家买菜作饭，头脑里是一片空白！我去小杂货铺买酱油时，突然发现程贤策正在那里买一瓶名牌烈酒。他已换了一身乾净衣服，头发和脸也已洗过。他脸色铁青，目不斜视，从我身边走过，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没有看见我，还是视而不见，还是根本不想打招呼，总之，他就是这样从我身边走过，最后一次！我当时默默在心里为他祝福：“喝吧，如果酒能令你暂时忘却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

我们那时生活非常艰难，每天都被“勒令”在烈日之下趴在地上拔草十来个小时，同时接受全国各地来串联的革命小将的批斗（包括推来搡去和各种千奇百怪的“勒令”）。就在这样的情景下，全国最优秀的翻译家之一，曾为周总理翻译的吴兴华教授中暑死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教授被“勒令”收集革命小将们扔得满校园的西瓜皮，晕倒在地，未能得到及时救治，也死了。在这重重噩耗中，我的心已经麻木冻僵，似乎已经不再会悲哀。后来，我被告知我心中的那个欢快、明朗，爱理想、爱未来的程贤策就在我买酱油遇见他的第二天，一手拿着那瓶烈酒，一手拿着一瓶敌敌畏，边走边喝，走向香山的密林深处，直到生命的结束。当“大喇叭”在全校园尖声高喊“大叛徒、大特务程贤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时，我已经没有眼泪，也没有悲哀，只是在心里发愁：程贤策的尸体差不多两天后才被发现，在这酷热的盛夏，在那人人要划清界限，惟恐沾身惹祸的日子里，程贤策的妻子怎样才能把他的尸体送到火葬场啊？

1948年，我和程贤策一起来到北京大学，这里有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我们的回忆，也有无数我们对生活、对苍天的疑问。这一切，连同那一曲迎风高歌的“啊！延安……”都将化为烟尘，随风飘散，再无踪影，只有那黑水洋上翻滚的波涛和那无垠星空中一轮皎洁的明月将永远存留在我心底。

□ 摘自《绝色霜枫》，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期编辑: 华新民 (美 国) <cnd-cm@cnd.org>